

从“贝勒爷”到全国政协委员

◆ 薄仕

人们叫他“老载”

1949年初,北平和平解放。人民政权建立后,首任街道派出所所长登门拜访。他告诉父亲:“你虽然是皇族,却不是顽固守旧的遗老。从辛亥革命到国民党政权垮台,在政治上你做到了一尘不染,很不容易。在群众中有威望,现在请你出来参加街道工作。”从此,协助民警查户口、与邻居搞卫生、支援抗美援朝活动……都会出现父亲的身影。其中令父亲津津乐道的一件小事是,人们不再称呼他“七爷”“贝勒爷”,而改称“老载”。他觉得很新鲜,好像这个新称谓缩短了自己和人们的距离。

1950年春,父亲挚友、民革中央主席李济深来访,二人深谈良久。后来得知,李济深已向周恩来总理介绍了父亲情况,鼓励父亲要为新中国作出贡献。不久,父亲应邀列席了全国政协一届二次会议。会上周总理的一席话令他激动不已:“一届一次会议没请您参加,怪我有大汉族主义。要不是李济深提醒,我把您这位满族人民的代表给忘记了。”总理不但表示了诚挚的歉意,还送给他一本政协一届一次会议的纪念册,进而请他发挥自己的才干,向大会写提案。

当好人民的“弼马温”

同年夏天,父亲提出的《改良军马以利军用》的议案经毛主席、朱总司令批准,并交炮兵司令部落实。父亲捧着毛主席签署的委任状高兴地讲:“我演猴戏,孙悟空只当上了天廷上的弼马温。这回毛主席让我当上了炮司马政局顾问,那我就得当好人民的‘弼马温’。”

1950年冬,中央军委为了满足抗

美援朝志愿军的需要,朱总司令直接下达命令,让父亲和他的战友们选购两万五千匹军马转运朝鲜。父亲不辱使命,圆满地完成了任务。紧接着,父亲又赴东北、西北各军马场,视察调研并开展改良马种的工作。

年过六旬的“载顾问”奔波在甘肃、宁夏、青海,不畏严寒风沙,不辞辛苦劳累,甚至身上长了虱子,棉被缝里残留着耗子屎,仍然干劲十足地工作着。马政局干部郑新潮(郑新潮,黄埔军校七期学员,1939年赴延安,抗战后创办我军第一个军马场,后调往河北省邢台市工作。——作者注)曾问他:“过去您老没吃过这苦吧,您哪儿来的这劲头,一点都不比年轻战士差。”他爽朗地笑笑,拍拍腰间的手枪说:“当兵的不能怕吃苦,我现在为新中国服务,为人民军队服务。周总理礼贤下士,朱老总把全军的军马担子交给我,我心甘情愿吃苦。当年土匪原拿手枪逼我去伪满当骑兵总司令被我拒绝,那是不甘心忍受外侮,宁死也不做民族的败类。我这劲头就是这么来的。”

父亲西北之行有两件事值得一提。一是在塔尔寺会见了十世班禅额尔德尼·确吉坚赞。在历史上,清朝三百余年统治者的民族融合政策,使历代达赖和班禅与清政府的关系很融洽。此次皇族后裔以人民解放军干部身份来青海工作,十世班禅很感兴趣,特约相见畅谈并互赠哈达。二是在宁夏工作期间见到了久别的女儿、女婿和一群可爱的小外孙,尽享天伦之乐。他的女婿达理札雅,蒙族,是阿拉善旗亲王。在解放战争中,他深明大义,率领全旗和平起义,后任内蒙古自治区政府副主席。女儿金允诚(满名爱新觉

我的父亲爱新觉罗·载涛(1887—1970),字叔源,号野云,满洲正黄旗人。作为其幼子,我在父亲膝下生活30年,耳闻目睹故人旧事,至今不敢忘却。

罗·温慧)承袭满蒙通婚传统,在草原上数十年夫妻相敬如宾,并在文教卫生妇幼方面作出很大贡献,后任宁夏妇联副主任。父亲看到亲人的巨大,深感欣慰。

1954年,父亲参加了北京市人民代表大会会议,并在会上被选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。会议期间,彭真市长、刘仁书记与他亲切交谈。刘仁知道父亲是“老北京”,在不经意间问道:“您久居北京,跟您打听个人,不知道认不认识。”他叫什么?“金溥安。”这一问一答道出了一个秘密。刘仁告诉父亲,这个金溥安在敌伪时期任西陵守备队队长,保护皇室墓地。他的部队虽无重武器,可也是一支武装力量。经过我地下党工作,已就起义大事商量妥当,但是事后此人消失了。

父亲听后既惊喜又无不遗憾地告诉市委书记:“金溥安是我的第三子,1944年突患脑溢血病故。”令父亲感到欣慰的是,自己的孩子谢世前投向了人民革命阵营,虽然壮志未酬,但是金溥安的三个女儿先后穿上了军装,走进了人民解放军的行列。金霁月,毕业于长春白求恩医学院,是一位出色的部队军医;金霁珧,参加湘西剿匪战斗,后入朝作战;金霁秀,一位多才多艺的姑娘,成长为广州军区战士文工团演员,常年为部队服

务。直到晚年,父亲总以这三个孙女为傲,对别人津津乐道。

贝勒、亲王、土司,成了人民代表

同年9月,全国人大一届一次会议召开。昔日郡王銜多罗贝勒(贝勒全称为“多罗贝勒”。清代宗室封爵有十二等,前三等为和硕亲王、多罗郡王和多罗贝勒。加“郡王銜”表地位高出一般“多罗贝勒”。——作者注)与全国各族人民代表一起共商国是。会场内外,大家特别关注父亲和另两位代表。一位是父亲的女婿、蒙族代表达理札雅,一位是达理札雅的女婿、藏族代表班麻旺秀(又名杨复兴)。三位代表,三个民族,两代女婿一起与会。这不就是中国各民族大团结的写照吗?达理札雅的女婿杨复兴,共产党员,甘南军分区副司令员,积极参加剿匪平叛战斗。他出生于世袭土司之家,但是他追求进步,主动废除沿袭三个朝代、历时530多年的土司制度,为解放事业做出重要贡献。

这两位女婿进京赴会时,父亲不让他们住大会接待部门已安排好的高档饭店,非要他们挤住在家里。那低矮的平房、简陋的设施实在不能接待“高官”。可是这两位旧时的王爷和土司十分乐意这种安排。父亲更是得意地说:“这才是一家人嘛!咱爷儿仨现在是人民代表,住在平房大杂院里会更好接近人民。”

1955年7月5日,父亲出席了全国人大一届二次会议。在大会休息的时候,周恩来把父亲介绍给毛主席,毛主席握着他的手高兴地聊了起来。事后,父亲告诉我,在谈话中毛主席特别肯定了清朝的两位皇帝康熙和乾隆,指出他们在反对侵略、反对分裂、

维护国家领土完整、促进民族团结方面对祖国作出的贡献。平时父亲饮酒由我控制,每次只给他斟两小盅。为了身体健康,父亲乐于接受这种限制。可是那一天,他说:“今天我可要喝酒三杯!”不久,父亲被选为全国政协委员,积极参加政协组织的活动,并被推举为民族组副组长。

1956年春节,按往年惯例,我陪同父亲到李济深家拜年。老友相见格外亲切,交谈中,李伯伯提出了一个令父亲深思的问题:“你原本是晚清重臣,皇室成员,现在是人民代表,为新中国服务。你愿意加入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吗?”父亲听后点头表示应允。不久,民革中央主席李济深作为介绍人,引领父亲正式参加了民革。曾经的清王朝代表人物加入了推翻末代王朝的革命组织,对于父亲来说这就是革命。

1957年,父亲又出任北京市民族宗教事务委员会副主任,作为满族中德高望重的前辈,遍访郊区县少数民族聚居地区,宣讲民族政策,检查有关民族工作情况。所到之处,均受到群众欢迎。听到大家都尊称他为“载老”时,他感慨万千。“七爷”“贝勒爷”“老载”“载老”,这四个称谓,反映了时代的巨大变化,更令父亲感到,只有在新中国,人民的关系才是平等的,互相尊重的。他庆幸自己赶上了新时代,看到了中国的新生、民族的新生、家庭的新生和自己的新生。他有幸经常聆听周总理教诲,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就是:“听周总理的,活到老,学到老,改造到老。”

1970年9月2日,父亲在北京逝世,终年83岁,骨灰安放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。

(摘自《纵横》2016年第6期)

唐山抗震救灾亲历记

游玉云



17.掩埋病马

一匹马突然浑身发热,呼吸困难,不久便死去了。有个农民不知马得了什么病,草草埋了。我们身着防化服装,冲进靠山坡的村庄,包围了那户农民家。

上午9时许,政治助理员带着医疗队一位姓高的医生来了。他们戴着防毒面具,费力地打着手势,指挥全面消毒。我跑到每个战友面前,拍着他们的防护头盔:“分两组行动,背枪的警戒村庄,背喷药器的立刻分头进行彻底消毒!”

战友们背着喷药消毒枪对着残墙断壁喷射烟雾。这个村庄虽然不富,却也有五六栋砖墙水泥楼房。大概这些楼房是农民汗水浇起来的,所以仅有两家楼房倒塌,其余几家楼房依然醒目地立着。顾金富带着三人,来到这些楼房前,端起枪就喷射,烟雾弥漫。高医生跑来指导:“消毒不彻底,要向上喷射。”顾金富按照指点,把三支喷枪胶管和两根发烟胶管连接起来,改装成了十多米长的“新式”喷射武器,对着楼房顶端猛烈喷射。

五个小时的人造烟幕,使全村暴露部位盖上了一层消毒液。残留的死角,亟需及时补上消毒液。残墙断壁下的角落里,使用喷射枪消毒等于高射机枪打苍蝇,无济于事。我们放下喷射枪,改用脸盆、木桶和罐子盛上消毒液浇洒,一盆盆、一桶桶、一罐罐的消毒液泼向各个角落。三个小时的阵雨,死角消灭了。我们感到浑身疲乏,战友们帮我们脱下防化服的时候,情不自禁地惊叫道:“哎哟,烧伤了!”我们的裤腿和袖口全被消毒液烧坏了,脸和手、脚和腿脱掉了一层。

傍晚,一位中年农民拉着高医生:“同志,村东张大汉家的病马埋在村后的土岗上,你们快去看看,要不要消毒?”“啊,必须马上深埋!”高医生急切地叫道。他拉住顾金富:“快组织人到村后去!”顾金富努了努嘴:“这事要由队长下命令。”高医生转而拉住我:“死马埋在村后,你们赶快帮助深埋好吗?”“深埋?怎

么深埋?”我不解地问。高医生不做解释,拉着我们奔到村后的土岗上,急促地说:“快挖开死马土丘,再重新挖一个深坑埋死马。”

战友们挥镐舞锹,挖成了一口三米多的深坑。我和晋太和站在坑沿,用钢镐勾住马脊背,命令其他战友闪到一旁去。我和晋太和握住钢镐柄拼力往上拉,顾金富在坑里用锹拼命往上顶马尸首。费了很大功夫,终于把这匹死马转移到了深坑里。我喘了口气,准备换人埋土,顾金富却说:“不用了,你们休息一下,我来埋土。”他利索地推土埋死马,埋到最后几锹土时,忽然“扑通”一声,他栽倒在地,我大惊失声:“顾金富!”我冲上去抱住他:“快抬到村里去抢救!”战友们替顾金富同志脱下了防化服,只见防化服里积蓄的汗水已浸过了他的双脚。

风雨飘摇的帐篷里,周幸生一人孤独地躺在单人床板上,忍着伤痛翻动身躯。“又来了!又来了!”外面喊声大作。我以为余震又来了,和战友一起端枪冲向灾民集居的防震棚前。

雨帘下,惊慌的村民心有余悸地议论着:“我看到了,一跳一跳,当当响。”“我听到了叫声,刺耳得很响。”“我闻到了一股怪味,恶心着哩。”我问:“你们到底看到了什么?”他们围住我们:“你们快去抓吧,有个怪物,刚才在我们这里作祟,可吓人了!”我带领战友们消失在雨林中。

夜幕下,金志勇喊道:“你们看!”十多米外的废墟上,一只动物一跳一跳,既不像羊,也不像狗,更不像牛和马。“怪物!”我喊道,“大家按我的命令统一行动,包围那废墟!”“噔噔噔!”战友们迅速拉开一定的距离,扑向废墟。

怪物立在倾倒的墙角上,昂着头。孙杰扑上去,“腾!”它跳开了。金志勇瞄准它,脚一跺,扑上去一抱,却扑了个空:“鬼崽子!”晋太和赶鸭子似的双手摆动着:“嘿嘘!”

怪物漫无目的地东蹦西跳。我们从这头奔到那头,又从那头赶到这头,忙得不亦乐乎。怪物似乎精疲力竭了,跳到一根圆木梁上,一动不动,我们紧紧围住它。“冲上去!抓住它!”我大声命令。战友们立即猛扑了上去。“抓住了!”晋太和抱住怪物如获至宝。

13.重落魔窟

一天早晨,马匪将我们集中在修道院前的空地上,一个军官恶狠狠地说:“共匪,你们听着,从今天起,你们抬我们受伤的兄弟去西宁。如果谁不老实,想逃跑,那就砍他的脑袋!”匪军官说完,抽出马刀在晨光下舞了几舞。于是,我们4人一组,用担架抬一名马匪伤员,马匪骑兵则在旁边监视。那时,我们的头发又脏又长、脸色苍白,衣服破成条条片片,人虚弱不堪,真比叫花子还叫花子啊!我本来体质就差,自己走路都很累,又怎么抬得动担架呢?何况,我觉得干这事有损气节,走了没几步我心一横,心想宁可被杀死,也不抬马匪了,遂对马匪骑兵说:“我抬不动了。”马匪一听,口里骂着,挥起鞭子向我猛抽。鞭子雨点般落在身上,钻心似的疼,我气得干脆躺在地上闭上眼,随便马匪怎么处置吧。马匪见状,只好去抓了一个老百姓替我的缺,叫我跟在队伍后面走。

晚上,队伍到了一个大庄子,马匪将我单独关了,怕我们集体逃跑。第二天,马匪又叫我抬,我仍然不答应,那个马匪暴跳如雷,睁着一对绿兮兮的鼠眼,操起一根木棒,大骂道:“好厉害的共匪!”便向我一阵猛打。顿时,我浑身凸起一个个青疙瘩,我怒目圆睁,站在地上岿然不动。马匪见我不怕死,棒子举在半空不敢落下,忽地转身,又去抓老百姓了。

我乘马匪远去,立即往旁边一闪,向村子旁一条小泥路跑,见前面有条沟,纵身跃了下去。在沟里,我可以观察马匪的动静,而他们看不到我。我灵机一动,假装大便,如果被马匪发现,就有话说了。我蹲在沟里半个小时左右,见队伍消失了,立即呼地站起,长长地吐了一口气,不禁仰望苍天,哭着说:“党啊,我一定要回到陕北去!”

这个地方天空灰蒙蒙的,分不清东南西北。我正焦急,忽然见到一点太阳光,遂判断出了方向,一溜烟沿着山坡的羊肠小道走。走了很长一段路,始终见不到房子,偶尔遇上几个看山、放羊的人。到了晚上,我饿得实在走不动了,便找到一个羊圈钻了进去。4月的西北,依然春寒料峭,我在羊圈里被呜呜呼叫的西北风

吹得浑身颤抖,昏昏沉沉地睡到了天明。

醒我来揉揉眼睛,发现山坡上有一个小茅棚,就半爬半走地到了棚子前,里面走出一个浑身衣裳打补丁、满头白发的慈祥老太太,她见我这副模样,便问道:“娃子呀,你打哪儿来?”

“老太太,”我谨慎地回答,“我是要饭的,请您开开恩,给点东西吃吃吧。”其实,老太太知道我是为穷人打天下的红军,她颤抖着拿出了几颗土豆和剩饭,递到我的手中,我立刻狼吞虎咽地吃了起来。老太太抹着泪说:“可怜的娃子,快吃吧,吃了快跑,我这儿不能留你呀!”当时马步芳、马步青下过告示:凡是收留红军的,全家斩首。因而,老百姓不敢收留我们。就这样,我晓行夜宿,穿山路、睡羊圈、讨饭吃,一个星期后到了凉州地界。

一天下午,我在一座荒山包前碰到了一位也是被俘后逃出来的西路军战士,我们一阵欣喜,加快步子向前跑,来到了一条大河前。那河较宽,浑浊的泥浆水潺潺地流着,咱们不知河水深浅,不敢蹚水过河。这时,河对岸有一个庄稼人挽了裤脚,下河趟过来了,原来西北干旱,河都

不深的。我们马上蹚水过去,来到一个大庄子前,这庄子像个小城堡,为清代建筑,乃入凉州的一个关卡。我们刚要过关,斜刺里窜出几条彪形大汉,一齐拔出手枪对准我们,为首的吆喝道:“好大胆的共匪,你们逃得了吗?”原来这伙人是马匪便衣,专门守在这儿伏击逃跑的西路军将士。他们疯狂地扑过来,把我们五花大绑押往凉州,重又落进了魔窟。

远远地,我望到了凉州的古老城头,一只苍鹰在城楼上空盘旋,更加严峻的考验又开始了。

凉州古时名武威,西汉大将军霍去病在河西走廊打败匈奴后在此建郡县,意图汉武帝军威至此。此乃古丝绸之路,扼东西交通之咽喉的战略要冲,自古以来战争不断,唐朝安史之乱、薛丁山征西,宋朝西夏兵犯边廷等,均在这西凉点燃过狼烟,现为马步青的大本营。

我们进入凉州城前,马匪将我俩分开,关在一所小学里。第二天,送进城里的大监狱,那儿已经关了500多名西路军将士。

西路军幸存者备忘录

秦维宪

